

粉墨登场



王丽达饰歌剧《我有一个梦想》中的江美丽。

4月18日晚，大型原创歌剧《我有一个梦想》在株洲神农大剧院上演。该剧由株洲戏剧传承中心历时三年打造，集结国家一级导演黄定山、编剧盛和煜、作曲杜鸣及指挥王燕等顶级团队，将七十载机车制造史淬炼成舞台上的热血篇章，将株洲的历史变迁与工业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

硬核工业到歌剧艺术的华丽转身

这部歌剧在叙事结构上别出心裁，采用三幕剧的形式，巧妙跨越近百年的时光。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专家撤离，技术攻坚陷入困境时的艰难抉择；到改革开放浪潮中，南下广东的诱惑带来的内心挣扎与行业发展的抉择阵痛；再到新时代“复兴号”高原试车面临的巨大挑战，情节层层递进，扣人心弦。每一幕都仿佛是历史的切片，将那些关键的时刻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剧中，动人的歌声是情感传递的桥梁。林驰南与程冲的“兄弟像杯酒”二重唱，醇厚嗓音交织，饱含兄弟深情，更展现出面对困难时坚如磐石的决心，令观众为之动容；江美丽的“我的爱为你而

来”，歌声温柔婉转，如涓涓细流，传递出小家的温暖与珍贵；林江雪“我的青春只为中国机车绽放”的独白激昂有力，宣告着新生代机车人的壮志豪情，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血。

此外，主创团队在创作过程中，更是展现出了十分精湛的技艺。剧中林江雪与田志远关于技术路线的激烈争论，格外引人注目。舞台上，两人你来我往，言辞犀利，眼神中透露出对各自观点的坚持。这一情节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暗合了中国高铁发展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真实历程。

回溯2004年，株洲轨道交通企业通过“市场换技术”引进国外先进动车组技术，年轻工程师们在实验室里日夜钻研，在车间中反复试验，在消化吸收中展开艰难的技术攻坚。最终，实现了从“和谐号”到“复兴号”的自主创新。而剧中的这场争论，正是这一“大国重器”诞生背后无数次技术博弈的艺术缩影。

高原试车时速300公里的场景更是震撼。舞台上，风雪特效逼真，寒风呼啸、雪花纷飞，电子音效模拟机车高速行驶的轰鸣声。演员们生动演绎试车的紧张危险，让观众身临其境。其原型是中国动车组在青藏高原、东北极寒等极端环境下的试验，体现了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精神。

工业基因与时代精神的激情碰撞

《我有一个梦想》深深扎根于株洲这片孕育了工业奇迹的土地。当剧中“电力机车厂”的场景出现在舞台上时，观众一眼便能认出，它的原型正是大名鼎鼎的中车株洲所。“韶山号”“复兴号”等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元素，也与株洲的科技创新紧密相连。

剧中的群像塑造更是生动鲜活，仿佛是用细腻的笔触精心勾勒出一幅株洲工业精神的群像图。

林驰南斩钉截铁地说出“开弓没有回头箭”时，坚定的眼神、有力的手势，直击观众的内心。程冲深情地唱出“刻下我的名字”，话语中满是老一代工匠对自身技艺的高度自信，以及对事业无

比崇高的信仰。这些剧中角色，清晰地映照出现实中株洲产业工人群体辛勤奋斗的身影。

他们的每一滴汗水、每一份努力，都传递出株洲作为“制造名城”坚定不移的文化自信。他们的铿锵誓言，更是呼应着株洲工业史上无数“第一次”的突破：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空空导弹、第一块硬质合金、第一台摩托车、第一台激光陀螺……

青春叙事与工业史诗的奇妙交融

尽管这部歌剧题材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沉重的使命感，但它却成功吸引了老中青三代观众。其秘诀就在于，它巧妙地将波澜壮阔的“工业史诗”转化为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的“青春成长故事”。

舞台上，“弹片传承”的父女情令人动容。林驰南郑重地将弹片交给林江雪，他的眼神中满是期望与嘱托。在这一瞬间，观众们似乎能感受到这份传承背后的重量，看到一个家族与国家工业发展紧密相连的故事。

江美丽与林驰南的“鱼汤爱情”，则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息和细腻的情感。他们在舞台上的互动，就像发生在身边的家常故事，温馨而又动人。这段情节就像一首温馨的小夜曲，让大家在感受工业发展艰辛的同时，也能体会到生活中的美好与温暖。

这些家庭情感元素的融入，消解了工业题材可能给年轻观众带来的疏离感。他们能在剧中找到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感共鸣点，看到了自己家庭中的亲情、友情与爱情，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感受这部作品的魅力。

当“复兴号”在舞台上的雪山背景中飞驰而过时，逼真的场景、震撼的音效，让现场观众都沉浸其中。刹那间，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不仅是对艺术创新的礼赞，更是对中国工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深情致敬——那是林驰南手中承载着历史的弹片，是程冲刻在轨道上的荣耀名字，是林江雪雪地里饱含着壮志的呼喊，是一代又一代机车人“奔向美丽远方”的不朽初心！



歌剧《我有一个梦想》剧照。

打卡“湖湘一万年”

时令进入季春，天气逐渐从温润转向湿热。“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湖湘大地上，翻耕后的稻田呈现出“九分谷水一分青”的景致。

水稻与湖湘大地有着“天作之合”的机缘。湖湘一万年，稻米是这方水土养育万民的主粮。湖南水稻面积和产量长年居全国首位。玉簪岩遗址出土的5粒稻谷颗粒震惊世界；八十垱遗址的水稻遗存，城头山的稻田遗址，默默诉说着稻作文化的历史。水稻也存在于文明传承和文字记忆之中。商代，这里的人们就将“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望铭刻于金石器皿之中。在湖南博物院，展出了一件出土于宁乡的商代“大禾人面纹方鼎”，鼎腹内铸有“禾、大”两字。商周时期，湖湘大地上，祭祀时的食物有多丰盛？稻禾有多“大”？从屈原和宋玉所著的辞赋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翻开《楚辞》，我们沿着《招魂》和《大招》诗意般的记录，穿越到三千年前的某个秋日。傍晚，“日方春”，残阳如血、晚霞似火，村落中心的屋场上点起熊熊篝火，一场为天神和山鬼“招魂”的祭祀仪式正在举行。屋场周围，堆满了数堆高达六仞的储粮草垛——“五谷六仞，设藟蜜只”！对于屈原在《大招》中所称的“六仞”，南宋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直接解释为稻禾“其穗长六仞”，

若“一仞”等于“一寻”，那应该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但无疑也反映了湖湘大地稻谷的壮实。回到祭祀现场，活动后的家庭聚餐更是盛大：“稻粱饔餐，掌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吃食有干有稀，有甜有辣。除了米面等主食，肉食的烹调方法也很多，体现了“食不厌精”——“肥牛之腱”要烧得烂熟，“膾炙炮羔”要拌上甘蔗浆吃。“瑶浆蜜勺，琼浆玉液喝了一杯又一杯。真是一派难得的丰稔景象！

贾谊谪居长沙时，感伤于“长沙卑湿”“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其实湖南这种气候条件，十分适宜水稻的栽培种植。夏季高温多雨，土壤养分充足，有利于水稻的分蘖、移栽、开花、孕穗、拔节、结实、收割；冬季寒冷干燥，又有利于稻种的储藏。但仅凭借于刀耕火种，水稻的产量无法满足人们的口腹之需。湖南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与耕作工具和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宁乡炭河里商代遗址，出土了斧、锛、凿、石刀等石质农具。长沙识字岭、左家塘、砂子塘等的春秋楚墓中，发现了大量铁制农具。秦汉时的铁制农具更是有丁锄、斧、锛等精细分工。进入隋唐时期，耕牛和曲辕犁的推广使用，促进稻作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刀耕火种到牛耕犁种的升级，使水稻

产量大幅提升。

种子是丰收的起点。水稻的丰产，离不开良种。追溯到一万两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玉簪岩出土的稻谷兼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特征。马王堆竹简记载了西汉时期在湘江流域广泛播种的“稻白禾米”和“稻白鲜”等品种。宋初，醴陵引进占城早稻和晚稻。明中期，双季稻种植实现大面积推广。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的粮食单产和面积实现大幅提升，湖南粮食大量东运和北运，“湖广熟”，“天下足”。清朝康熙末年，湖南大米年输出500万石左右。在长沙，从事大米交易的牙行、大米加工的碾坊大量出现，长沙逐渐发展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然而，在封建社会逐渐没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湖湘大地并不存在田园牧歌式的安宁。在清代，湖南的田赋、火耗、平余等赋税五花八门，平均田税在全国最高，而湖南水稻的单产，从明末清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三百年间，停留在亩产3石至4石（225市斤至300市斤）。时代车轮驶入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以来，水稻种业科技实现了三次重大飞跃。20世纪50年代，水稻矮秆育种成功；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选育成功；90年代中期，超级稻研制成功。水稻单产拾级而上。从此，

禾大谷香

郭丁文

人们告别了饥饿，也记住了黄耀祥、袁隆平等“当代神农”的丰功伟绩。

谷雨时节，长沙城郊的产粮大镇——湘江新区白箬铺镇，白鹤山下“有溪自西东注”，白箬河边“桃李缤纷，幽艳异常”，田埂上开满了五彩的山花、田间的紫云英和油菜花好像一幅油画。土地仍然是千年前的沃野，但生产场景却今非昔比。从春到秋，智能化、绿色化的生产使人产生梦幻般的错觉。占地十五亩的集中育秧工厂生产的秧苗能够供给五千多亩的稻田移栽；随着气温变化调节水、肥、温度的自动化系统，使秧苗能够躲避“倒春寒”、雷暴大风、春雪、冰雹等灾害气候的突袭；无人驾驶的小农机来回穿梭翻耕移栽；远程遥控的无人机整齐划一地在水稻施肥；灯光诱导式生态除虫设备在保证水稻产量的同时提升着稻米的绿色品质。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湖湘稻作文化从远古之初走来，走向更远的未来；流淌于岩洞，跨越山海造福世界。袁隆平在《妈妈，稻子熟了》诗意地描绘了“禾大谷香”的美景：“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毕剥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韵味。”一切收获都得益于泥土，一切伟大均孕育于平凡……

艺览纵横

长沙那个张小纲

盛伯骥



《窗 系列之二》纸本水彩。

张小纲 作

前几日，从深圳美术馆来了一大帮美术名家，在湖南美术馆轰轰烈烈举办了一场大展，即“南去北来为何事——张小纲艺术展”。这位如今在深圳发展的著名水彩画艺术家张小纲，也是长沙人张小纲。

开幕式的那天，我也受邀参加，原因很简单，张小纲是我的小学同学。在湖南幼师附小，张小纲高我一级，这也不妨碍我俩至今还记得当年画成糍的杨福音老师和专画主席像的陈植根老师。后来我们1967届和1968届小学毕业生，合为一届，进入了中学。因为就近入学的原则，张小纲上了长沙市十三中学，我就读长沙市二十五中学（由长沙师范改为普通中学，后又改回长沙师范）。我们两所学校仅隔一条不宽的马路，让我至今记忆深刻的是，每天中午放学时，从对面十三中走出一队精神抖擞、气宇轩昂的帅哥。这支放学路队成为了当时全市中学生中的楷模，其中就有张小纲。今天看来，自律与进取是青春的烙印，朝气和求上更是人生的铺墊，据说这支路队中不少同学都成为社会俊才。

我们高中毕业时，正逢湖南省轻工业学校工艺美术班招生，全市许多同学报考，张小纲理所当然榜上有名，我名落孙山。后来张小纲又考上湖南师大美术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任教研室主任。此时，张小纲已成为全国水彩画派的一位青年才俊，其不少作品被“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全国水彩·粉画作品展”“中国艺术大展”相中，一时成为全国水彩画界风云人物。

记得20世纪80年代，湖南一批中青年画家组建了一个“枫林画会”，我为他们拍摄了一部名为《探索·求新——枫林青年画家们的话》的专题片，其中张小纲的作品《那蓝天的一朵白云》让我记忆深刻。这部专题片的拍摄不但使我对水彩画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也对长沙的水彩画家们有了一次深入的接触。前不久，画家陈新告诉我，他至今还保存着这

艺苑杂谈

黑白线条里的《读者》时光

贺事实



《查理叔叔》黑白插图。 李晓林 作

一日，独自走进李自健美术馆看馆藏作品展。转过一个拐角，忽见墙上挂着一组黑白插画，在众多色彩斑斓的画作中，格外夺目。尺幅不大，寥寥几笔，画中人物和故事，令人联想。定睛细看，原来这是央美教授李晓林为《读者》杂志绘制的一组插图。

这组插画作品，以极简的黑白语言展现故事情境。画中，背景常常是绝对留白，或平涂几笔带出人物的环境，契合中国画“计白当黑”的理念。人物轮廓线清晰，有版画的粗犷感，造型姿态夸张，戏剧性强。《查理叔叔》中，一扇半开的门，门外是个工整而略显拘谨的中年男子，门内是一个托腮看向画面之

外的男孩。粗犷的线条与深沉的黑色块面，让两位人物共处一个画面，却似乎被某种无形的隔阂分开。《同样的世界》没有过多细腻描绘，两位带着岁月痕迹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扎根于现实人物形象，又以夸张变形的手法进行表现。

在这些插画前，我伫立了许久，恍惚间，回到了油墨与青春交织的中学年代。那时，《读者》是老师特许的课外读物，一本最新的《读者》是班里的硬通货，时常在全班排队传阅，直到边角卷起、封面破损。大家贪婪地从《读者》中阅读世界和人生。那些温暖的文字与励志的故事，不仅慰藉了年少的心，更化作笔下的作文素材。书里的插图，简单的线条，赋予文字温度，让想象有了具体的形状。虽然记不清当年的书页间是否看到过李晓林的作品，但那种被插图牵引着进入文字世界的悸动，仍清晰如昨。

也是通过展览才得知，李晓林教授与《读者》二十余年的缘分。1997年，还是央美研究生的他，因课堂习作被编辑相中，从此开启了这段漫长的创作之旅。李晓林曾说，黑白插图看似简洁，实则难以把握。插图创作需“文图对应”，要能读懂文章，精准提炼出最具代表性、关乎主旨内涵的语句，依此构思画面。他的作品摒弃装饰性。他坚信，优秀的插图会永远闪耀着人类艺术智慧的光芒，留存着人性的温情，与优秀文学作品相互辉映。

当年在《读者》上读过的故事，大多已记不清。《读者》仍在继续更新，李晓林还在为读者创作。我们有了更多样的方式去认识世界，文字和纸张倒显得怀旧，但在生活和工作的忙碌间，总还是很怀念，当年课桌上那本杂志带来的纯粹快乐，那是被油墨香晕染的、不可复刻的美好。